

# 抗日战争中我军战略运筹的胜利

■都吉庆

73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我军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这既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开始，也标注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运筹的全新高度。

73年后回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与我党战略运筹能力密切相关。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并结合形势变化及时完成战略转换，为赢得全面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因敌而变，而不是硬拼蛮干。抗战开始时，我党我军的力量非常有限，不能和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比，也赶不上国民党军队的水平。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弱小的力量，却在抗战中越打越大、越战越强。我军“以弱胜强”的奥妙，很大程度上在于高超的战略运筹。早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时，毛泽东就在1937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体现了我党对抗日作战的正确战略思想。

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几次大的会战打得轰轰烈烈，但并未挡住日军进犯的脚步。当时的战场实践表明，过去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游击战战略，已经不适用于艰苦复杂的全面抗战战场，而灵活的游击战争战略，又引起国民党对我党我军“游而不击”的指责，以及党内部分同志的困惑。在历史的紧要关口，毛泽东同志坚持“基本的还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先后撰写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策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战略文献，科学阐释了优势与劣势、



我党英明的战略运筹为赢得全面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强大与弱小、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战、内线与外线、主动与被动、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面与点、消耗战与歼灭战等辩证关系，明确了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3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关系，揭示了中日力量对比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战争进程从曲折到胜利的规律，得出“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不仅远超前日本侵略者的预想，还走在历史前面，预言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提前勾勒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胜利路线图。

破击敌后，而不是撒手放弃。抗战初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针对日军攻势凌厉、正面战场节节溃退、战线向我纵深及后方快速延伸的现状，审时度势地把我军的早期方针调整为“挺进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形象地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比作在沦陷区“做眼”（围棋术语），把建立战略支点比作“做眼”而投

下的一颗棋子。1937年9月，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3个主力师分别部署在吕梁、晋西北、晋东南3个支点，在大块与小块、面与点、消耗战与歼灭战等辩证关系，明确了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3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关系，揭示了中日力量对比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战争进程从曲折到胜利的规律，得出“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不仅远超前日本侵略者的预想，还走在历史前面，预言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提前勾勒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胜利路线图。

队的敌后抗战依然沿用正规军集中作战的套路，在复杂艰苦的敌后战场上很快消耗殆尽。

积极进攻，而不是坐等观望。纵观整个抗日战争，国共两党的战略决心是不同的。国民党早期的抗战立场是相对坚定的，但武汉会战后就基本放弃了战场主动，蒋介石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外反法西斯战场上，总幻想着在外国援助下打“顺风仗”，把重兵集团留在大后方静待观望，陷入“日军不进攻、国民党军队不反攻”的局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思想，以积极进攻的战略态势，和“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在内外线相互交织、日伪顽我犬牙交错的战场上坚持抗战，深入敌后“吃子”“做眼”，在防御、相持和反攻阶段争取主动，极大推进了抗战胜利进程。尤其是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在国民党军节节溃败，河南、华中大部及华南部分地区沦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果断提出“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实施“缩敌中原，控制河南、皖北”“发展东南，控制苏、浙”和“发展华南”等战略决策，组织多支部队发起局部反攻。抗战胜利时，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从最初的西北一隅扩展到华北、华中数省，总人口近1亿。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才是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作者系黑龙江省鸡西军分区梨树区人武部政委）



原典

“树上开花”原意指树上本没有花，但可将惟妙惟肖的假花粘在树枝上，制造出完美逼真的模样，让人真假难辨。在《三十六计》中，此计原文为“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意指借助别人的局面布成有利阵势，兵力弱小的军队可显得阵容强大。鸿雁高飞，停宿在陆地上，落下的羽毛可用来当作典礼上的装饰，长我气势。军事上指借别人的声势壮大自己的军威、震慑对手的一种计谋。

古代战例

公元前1245年，以色列民族英雄吉第安率军远征沙漠深处的阿拉伯人。不料，行军途中吉第安的军队与阿拉伯人的一支米甸人军队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由于米甸人占有数量优势，吉第安军队在交战中处于下风。

为了扭转不利态势，吉第安想出一个妙计。他选出300名精锐士兵，命他们趁夜袭扰对方营寨。当时的行军惯例是每百名士兵携带一支火炬，吉第安却让这300名士兵每人携带一支火炬和一个喇叭，这样就营造出3万大军的声势，使对方误以为吉第安军队的援军赶到。

半夜时分，以色列军队300名士兵高举点燃的火炬，同时吹响喇叭，向米甸人发起突袭。一时间，火光闪烁，声震四野。

米甸人在睡梦中被尖锐的喇叭声惊醒，发现周围全是星星点点的火炬，以为对方大股援军突然赶到，惊慌失措之下，自相践踏，望风而逃，伤亡惨重。吉第安则乘势指挥部队全面出击，大败米甸人。

现代战例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进行到10月13日时，西线埃及军队已渡过苏伊士运河，突破巴列夫防线，取得重大战果，正利用战斗间隙调整部署。而以以色列军队此时正全力进攻叙利亚，叙利亚反复催促埃军恢复进攻以缓解其压力，埃军于是在西奈半岛增兵，出动大批坦克继续进攻。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决定：停止北线进攻，立即将主力转至西线，与埃军决战，北线部队转为守，抽调兵力驰援西奈半岛。

北线以军指挥官霍菲将军于傍晚接



三十六计与古今战争

第二十九计：『树上开花』

张肇林

计谋分析

“树上开花”之计中，“树”指的是被借来助势的东西。在我方实力之“花”势单力孤，没有支撑的时候，不妨积极借“树”谋势造势。“花”是“树”的精华，“树”是“花”的依傍。首先要精心选好“树”，其次要巧妙布置“花”，这样才能达到以强示弱、以弱胜强的目的。

战争比其他任何社会现象都更难捉摸，更具不确定性。指挥员的主观判断很容易被各种假象迷惑。设置假情况、巧布迷魂阵，虚张声势，常常可以震慑甚至击败对手。因此，运用“树上开花”之计，通过精心筹划、设计创造出远超己方实际实力的浩大声势，往往能够有效迷惑敌人。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等待和创造战机，可以用此计迷惑调动敌人。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集中力量，从南北两面对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南线的欧震兵团为主要突击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北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北线的李仙洲兵团作为辅助突击兵团，企图捣毁我后方基地，配合南线部队歼歼我华东野战军。南线之敌重兵压境，中央军委指示华野“诱敌深入，集中绝对优势打敌一路”。但3路敌军都异常狡猾，无论我军采取什么诱敌手段，3路敌军都不上当，始终密集靠拢，齐头并进。而北线李仙洲兵团已孤军深入，威胁我军后方。华野指挥员于是提出“舍南求北，先打李仙洲”的方案。这一方案

在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华野副司令员粟裕运用“树上开花”之计，命2纵、3纵伪装成主力，宽正面展开，在南线与敌人进行所谓“决战”，其余部队从2月10日起，急行军隐蔽北上。粟裕还命令地方部队在兖州以西的运河上架桥，造成华野要向中原野战军靠拢的假象。同时我军还在黄河边大张旗鼓地找粮，进一步迷惑敌人。2纵、3纵两个纵队宽正面展开后，大造声势，采取运动防御，以空间换时间，打到2月15日，我军主动撤出临沂。国民党军占领临沂之后大肆吹嘘，称“鲁南大捷”，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殊不知，华野主力已在莱芜为李仙洲布好了口袋，从2月20日发起进攻，到23日彻底解决战斗，3天内歼敌5.6万余人，一举改变了山东战场的作战态势。

现代战争条件下，“树上开花”仍有可为。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军队的假技术有效欺骗了北约军队的空中侦察，吸引了大量造价昂贵的精确制导武器，使北约的空袭命中率与预想相去甚远。南联盟军队用木头制作了几千个假导弹，在全国搬来搬去，吸引北约的火炮；高速公路两侧每隔几公里就停放1架飞机或1辆坦克，有真真假假，让北约飞机真假难辨；南联盟军队还采取措施在可能被攻击的目标附近不断改变地貌和雷达背景，迷惑巡航导弹的目标识别系统，大大降低北约的打击效果，有效保存了自身实力。



发动机数量最多的导弹

历史上发动机最多也是最大的火箭是苏联研制的N1火箭，该火箭的第一级有30个捆绑在一起的发动机，但历次发射全部失败。

世界上发动机数量最多的导弹，没有N1火箭那么庞大的身躯，它就是美国1966年开始研制的M47“龙”式反坦克导弹。作为一种单兵可肩扛发射的反坦克导弹，“龙”式反坦克导弹体积小，弹体上却密布60个微型火箭发动机。这些火箭发动机并没有安装在导弹尾部，而是在其弹体中部。这是因为“龙”式反坦克导弹尾部拖着制导用的导线和标明导弹位置的红外发焰筒，如果把火箭发动机安装在尾部，不仅空间不够，还会把导线烧断。

向“勇敢者”鸣笛致意

舰船在海上相遇时，需要互相鸣笛致意。一般来说，民用船应首先向军舰鸣笛致意，低级别舰艇应首先向高级别舰艇鸣笛致意。但在各国海军中，无论舰艇级别高低、吨位大小，都会首先向一种有专门用途的舰艇鸣笛致意，那就是扫雷艇。这是因为，扫雷艇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扫除水雷，为其他舰艇开路，是不折不扣的“勇敢者”。

汤盆伪装地雷

诺曼底登陆战役发起后，盟军很快占领了滩头阵地，开始向法国内陆发展。如果纳粹德军的装甲部队能够迅速赶到诺曼底地区增援当地守军，缺少装甲车辆的盟军登陆部队就会被赶下海。为此，盟军通过无线电广播和其他渠道，号召德军占领区的游击队想尽办法迟滞德军装甲部队的调动。

迟滞装甲部队最好的武器，就是反坦克地雷，可武器本就不足的游击队没有那么多地雷。于是有人想了一个办法：把家里用的金属汤盆拿来，稍加伪装埋设在德军的必经之路上。不敢大意的德军不知路上的地雷是真是假，只得派人全部排除，耽误了很多时间，错过了增援的最好时机。

（乌沃）



“甲型一号”水上飞机模型

## 来之不易的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

■林陈彬 张苗

水上飞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9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9年8月9日，中国人试制的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便首飞成功。

作为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的诞生来之不易。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首次实现了人类飞翔的梦想。1910年，法国人费勃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起降问题，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虽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境地，但中国人没有放弃独立制造飞机的梦想，放弃航空救国的理想，一批学生远赴国外学习航空技术。这些留学生对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的研制功不可没，其中以巴玉藻和王助最为著名。

巴玉藻和王助，前者被钱学森称为“中国航空之父”，后者被认为是“波音飞机之父”。1916年6月，巴玉藻和王助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由于国内政局纷乱，他们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巴玉藻被美国通用飞机制造厂任命为总工程师，王助则成为波音飞机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至今波音公司在西雅图的博物馆中还有王助的铜像肖像，并刻有“波音公司第一位工程师”字样。1917年冬，国内局势稍稳，巴玉藻、王助怀揣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志向，毅然启程回国。经北洋政府批准，巴玉藻、王助等人于1918年2月正式在福建马尾船政局内创设我国



巴玉藻



王助

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他们集中优秀技工，进行专业培训；筛选国产材料，测试物理性能；利用船政局原有的机器加工飞机部件。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终于于1919年8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

“甲型一号”是一架单发动机双浮筒双翼水上教练机，木质机身，高3.88米，机体长9.32米，翼展13.70米，马力100匹，最大时速126公里，空机重量836公斤，载重1063公斤，飞行高度3690米，可航行3小时，航程340公里，乘员2人，可载炸弹4枚，其性能、质量不亚于同时代欧美各国的产品。

然而，闻讯而来的英国人在“海军飞机工程处”参观“甲型一号”后，却不屑一顾地说：“这种飞机更像一个玩具，只能供人观赏，绝对飞不

